

求是 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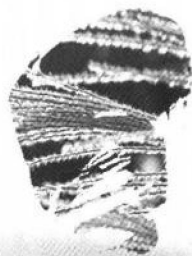
西方文明： 精神与制度的变迁



董小燕 / 著

学林出版社

求是丛书



西方文明： 精神与制度的变迁



A1017850

董小燕 /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明：精神与制度的变迁/董小燕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3.2

(求是丛书)

ISBN 7 - 80668 - 432 -8

I. 西... II. 董... III. 社会制度—社会变迁—西
方国家 IV. 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383 号

西方文明：精神与制度的变迁



作 者	—— 董小燕
特约编辑	—— 倪为国
责任编辑	—— 曹坚平
封面设计	—— 鲁继德
出 版	——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81号)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上海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 上海市中印刷装订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8.5
字 数	—— 19.1 万
版 次	——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5000册
书 号	—— ISBN 7 - 80668 - 432 - 8/B · 21
定 价	—— 16.00 元

总 序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汉语思想界、学术界最显明的特征:对“主义”的讨论,更关注、进入对具体“问题”的推进、考量,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将这种考量置于全球化的视域中,其思想资源也显示了多元化,对于各种思想资源的汲取、清理、运用也更显突出,无论在西学治学上还是在国学研究上,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

本丛书就是这些成果的林林总总,其积累涉及哲学、诗学、社会思想诸领域,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新一代学者在切实推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功夫之所在。

然中国思想学术处境之艰难在于:拒绝空疏浮论、拒绝苟且抄袭、拒绝无知谩骂、拒绝虚实不侔。倡导平等讨论、倡导严谨治学、倡导规范学制、倡导求是学风。摆脱、规避、走出中国思想学术之艰难非立竿见影之易,关涉一代求是学风的开启。故本丛书命名“求是”。

本丛书得到浙江大学金氏人文基金的资助,在此谨向基金捐赠人金乐琦、金联桢、金联照先生诚表谢意。

是为序。

“求是”丛书编委会

前言

一、文明的一般概念

文明的观点是由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出来的,相对于“野蛮状态”。顾名思义,文明就是光明、光彩的意思。一般认为,当一个民族(或地区)出现了定居的生活并产生了文字时,便告他们进入了文明社会。文明的概念提供了判断社会发展的一个尺度。但是,这一概念本身是不确定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文明的内涵和外延是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变化的。正如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一书的开篇写道:“‘文明’这一概念所涉及到的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等;它既可以指居住状况或男女共同生活方式,也可以指法律惩处或食品烹调;仔细观察的话,几乎每一事件都是以‘文明’或‘不文明’的方式进行的。所以,要用几句话囊括‘文明’所有的含义几乎是不可能的。”^①

一般意义上,文明与文化概念内涵相似,但既然是两个词,多少有些差别。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文化(Culture),源于

^①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研究》(第 1 卷),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61 页。

拉丁文“Cultura”,指的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等;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Civils”,有“城市国家、公民的、国家的”之意思。但两者的确切的含义究竟各是什么,目前学界尚未定论,理解也各不相同。

苏联学者认为:文明主要代表着一种物质形式,如镰刀和犁,火车和飞机,浴室与厕所等物质文明的成果;文化则主要表现在道德意识和与之相适应的活动,表现在哲学—人文学科的思维和艺术创作中。

德国学者把文明与文化作了严格的区分,认为文明属于物质的、技术的、客观的东西;文化属于精神的、信仰的、主观的东西。

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文明与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的文化,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①持同一观点的有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 ~ 1985),他把文明看作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领域的特征和现象的集合体。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 ~ 1975)也认为,文化是文明的精髓。文化成分是“它的灵魂、血液、精髓、核心、本质和缩影”,^②他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甚至把宗教看成是人类文明产生、发展的“力量源泉”和“基础”,

①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② 王少如、沈晓译:《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6页。

认为“文明取决于构成其基础的宗教素质”^①。

总之,关于文明本质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不同的看法,莫不与思想家们所处的时代、文化与学术背景和研究方法不同有关。它们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明的本质。对“文化”与“文明”概念的不同诠释,实际上体现的是不同的民族意识与文化精神。这些,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文明本质不无启迪意义。

我们认为,文明与文化没有截然的界限,都是学者们观察与评价人类历史整体状况的一种方式。从整个人类史来看,文化先于文明而存在。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定居生活的出现和文字的产生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端。所以美国学者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 ~ 1881)把人类起源后的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中义的文化指的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的文化则仅指社会意识形态,或社会观念形态。这三层文化观在一定意义上都与“文明”概念有交叉。文明是一种文化群体,根据文化特征可以把人类划分为不同的文明,就如同根据身体特征把人类划分为不同的种族一样。文明是人类群体划分的最高级、最广泛的标准。它以客观的共同的要素,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规章制度来界定。

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决定了人类文明具有

^① 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66 页。

普遍性。使环境更优美、精神更自由、生活更幸福,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同时,由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各民族又有各自不同的生存和发展道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态。迄今,世界文明的类型,大都以时空发展为标准作出划分。就文明发展的地域性视角而言,数汤因比的文明分类最为著名,在他不朽的《历史研究》中,汤因比按地域把全球文明分为23种类型,迄今仍活跃的有4种类型,即是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远东文明。亨廷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今世界具有7大文明类型: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就发展阶段性而言,主要划分为畜牧文明、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等几个阶段。

学者还以其他标准来划分文明。例如,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以“轴心期”理论为核心把人类文明划为“轴心期文明”与“非轴心期文明”。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将文明分为“压抑文明”与“非压抑文明”。

我国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早先把世界文明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欧洲文明四类,并认为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作用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而形成不同的文明(文化)特色。^①梁漱溟先生则把文明分西洋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三类,并对其中的文化特色作了精到的阐述,认为中国是伦理型文化,以讲五伦,互以对方为主;希腊是科学型文化,突出科学精神,强调科学与理性;罗

① 季羨林主编:《简明东方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马是政治型文化,表现为罗马法的制定与应用,罗马的扩张等^①。庞朴先生也曾探讨过几种文明之间的差异,认为希腊文化较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文化较重视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中东及印度则较关注人与神的关系等。

文明虽然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但它确实在演变着、发展着,在动态中显示着各自的特征。

二、西方文明及其特征

任何文明形态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著名法国史家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 1787 ~ 1874)认为,社会活动的发展和个人活动的发展是文明发展的标志和特征,也就是说文明是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的统一。^② 社会的进步,有不同的衡量指标,除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外,还有制度的健全与完善,而人性的进步根本在于人的精神的拓展与提升。社会的进步与人性的进步尽管通常不是同步的,但两者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一条向前进了,另一条迟早要跨出去的。人类文明恰似一个巨人,迈开步伐,不断地向前进,于是,社会愈益进步,制度日趋健全,人性更加完美。

文明的镜子是历史。文明的发展和变化,是由历史来显现的,文明是所有史话中最长的史话。西方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果从克里特文明算起,至今也有 5000 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西方文明的发展经历了曲折,也容纳

^① 参见梁漱溟《中国人:社会与人生——梁漱溟文选》(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6 年版。

^② 参见基佐《欧洲文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了各支流的文明,进而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文明个性。

有比较才能鉴别。西方文明的特点是在与不同的文明形态,尤其是与东方文明的比较中体现出来的。关于东西方文明的特点,自五四以来争论不休^①。有人认为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也有人认为西方文明是自然对立型、自然掠夺型的父性型物质文明,东方文明是自然顺从型、自然循环型、自然共生型的母性型精神文明。尽管如此,西方文明中对理性和人性的崇尚,对宗教的虔诚和科学的真诚,是公认的,其多元性、多样化也是显而易见的。

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发源较早的地区之一。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背靠海洋,境内多山多丘陵,不宜农耕。独特又恶劣的地理环境,使西方文明在形成之初就具有了多样性、多元化的特性。西方文明发展的历程不像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而是经历了多个中心的发展变迁。从地中海东岸的多利亚人,到地中海西岸的拉丁人,再扩展到西北欧的日耳曼人,他们带着各自的文化模式,登上欧洲文明的舞台,相互交流与借鉴,使西方文明发展呈现出较大的历史阶段性与差异性。在文化磨合过程中,又有不断的“蛮族”入侵,使得西方政治地图支离破碎,经济停滞不前,直至15世纪前,西方一直是世界欠发达地区之一,生产力、生产水平远远落后于东方世界。如黑格尔所说,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河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

^① 关于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性问题,可参考陈崧主编的《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历史发展到16世纪,西方文明发生了转机。经济的多样化与政治的分裂性,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发育与近代国家共同体形成的活性酶。在一些相对独立的城市里,也产生了诸如自由、平等、共和等一系列有益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新概念。17、18世纪的科学与启蒙,18、19世纪的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使西方文明开始走上了工业化、科学化、民主化的道路,在世界文明中最早迈入工业社会,成了世界现代化的先驱。

每一种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与一定时空相联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文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主题和特征。本书探讨西方文明精神与制度变迁史,起于希腊时代,止于19世纪。之所以截取这一时段,是因为此时的西方文明发展的阶段性较为明显、典型,尤其是精神和制度的演变此起彼落,不仅奠定和勾画出了西方精神个性和制度特性的基础和框架,也为西方文明日后的发展即现代化提供了起飞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此后开始的西欧现代化由于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步伐更加踏实。由此,在我看来,就精神与制度变迁而言,19世纪后的欧洲文明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的演绎,即在精神方面是对希腊、罗马独特的理性、人文精神,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平等与自由主义和市民文化的世俗性、民主性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从希腊城邦民主制、罗马的混合共和制、中世纪的有限政府到近代的共和立宪制,欧洲的制度变迁为现代欧洲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选择。

就空间而言,本书所言的西方,主要是指西北欧^①,由于北美历史发展所具有的独特的跳跃性特点,即它是在欧洲殖民统治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故此,我们把北美近代后的精神与制度变迁史,也纳入这一范围内。

由于精神和制度本身是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内涵。本书论及的精神变革主要限定在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对后世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想(或思潮),制度的变迁则以政治制度的演进与发展为主,兼顾政治体制的变革。

三、精神与制度

西方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结出过无数的硕果,精神和制度方面的成就是其中最丰硕的果实之一。它们是西方率先走向现代化的前提。精神是文化的提炼,制度是文明的结晶,精神和制度的革新与健全是任何社会变革的前提与关键。

当然,精神与制度的变迁首先是以物质生产活动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变革的需要。但是当物质活动作为基础性的东西决定精神与制度发展的同时,后者也通过影响物质活动的目的性和倾向性来制约物质活动,使物质生产方式服从精神(或文化观念)的引导。也就是说人们的精神活动(或为文化观念)是构成全部人类活动的一个必不可缺的灵魂。在物质条件所允许的可能空间内,文化观念引导着人们的物质活动指向不同的目标,从而对文明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例如,14、

^① 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大陆分化为三大文化区域。东南部,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拜占庭帝国为中心,该区域在15~19世纪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东部为斯拉夫区域;西部则是希腊罗马文化遗产与北欧-日耳曼文化的结合。

15 世纪,中国和西欧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大体相等,但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人们的精神活动领域得以大力拓展,催生了新的价值观,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随后几个世纪的社会大变革。在西欧进入近代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突飞猛进时,中国社会传统的生产方式仍然延续了几百年。制度的建设与健全,更加直接地依赖精神文化的拓展。比如,启蒙时期思想家们对未来资本主义的制度构想,奠定了新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这说明,尽管社会历史进程不完全由理性(精神)支配,但人类生活的理性程度还是决定了社会整体运行与和谐发展的程度。

精神活动与制度领域的变革和更新,不仅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先导意义,更重要的是它给文明(或文化)本身注入了活力,使文明的生命青春焕发、生机勃勃,香火不断。尤其是精神活动(领域)作为文明的灵魂与核心,一个民族(文明)一旦精神僵化,便失去了它的灵魂,无异于一具僵死的躯壳。

政治制度属于社会制度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形成的,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反映国家性质(即国体)的基本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相同的政治制度下,可能有不同的政治体制(如民主制、共和制、君主制等),适当的政治体制是维护和发展政治制度的关键,而适当的政治制度则是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关键。

精神与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文明的结晶。惟有不断地进行精神的自我变革,制度的自我创新,才是文明自我保存和发展的惟一途径。

西方精神与制度的变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充满了

迂回和艰辛。它既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也经历过剧烈的内部震动。时而步履维艰,时而狂飙突进。整个过程就像延绵不尽的山脉,有山峰也有谷底。每一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内容与方式,代际之间又相互衔接,互为因果。西方文明中精神和制度作为两个系统(或层面)发展通常虽非同步,但相互交织,构成了一部生动丰富、波澜起伏的精神与制度的变迁史。

尽管思想与制度的发展从来没有清晰的界限,但我们认为从希腊时代到欧洲工业革命这段历史中,西方精神与制度的变迁还是可以粗略地分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以希腊罗马为核心的古典时期。这一时期,既可以看作西方精神和制度的开端,也是以后发展和变迁的渊源。希腊精神中理性、人性,尤其是民主理想;罗马文化中的规范性(法律)和实用性,作为西方文明的“基因”,都溶入了她的文脉中。古希腊的民主理想经由日耳曼民族的自由精神的掺入,到卢梭那里发展成为人民主权不可分割、不可剥夺与不可转让的绝对民主思想,在民主实践上,西方也逐渐在以自由选举为保证的代议制中,找到了民主的表达方式。而罗马的法治精神则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欧洲精神的根本价值”^①——宪法精神。这种精神后来由英国人洛克和法国人孟德斯鸠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理想方式加以承继与发展。从希腊城邦到罗马共和,则是西方文明中政治发展的一种进步,对以后西欧制度的变迁影响深远。

第二时期,中世纪的宗教精神和教会、封建制度的确立和

^① 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欧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 页。

发展。一般认为这一时期西方文明发展处于低谷。基督教一统天下,禁锢了人性的进一步觉悟,而且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也相对滞后。但是,就我们所探讨的主题而言,恐怕不能一概而论。此时的西方精神转入一个新的境界,西方文明在动荡中换了文明的主角,精神文化相对落后的日耳曼民族认同并扶持了罗马社会的基督教,并把他们作为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精神把人与上帝联系起来,在“上帝创世”的背后,给每个人的命运带来了个人价值,灵魂的得救在于个人的信仰,而不在乎个人的出身、荣誉、财产。这种思想日后孕育的是个人的自由、平等精神和对个人幸福的向往。对人事的虔诚,对上帝的敬畏、献身自我,这些源于东方(犹太人)的精神和观念,被日耳曼人合理吸收后,与希腊、罗马以来西方所崇尚的理性、实用精神相结合,使罗马、日耳曼、基督教三重价值一起共同浸入西方民族的灵魂,而成为西方文明发展的主要基石。

这一时期制度的变迁在西方制度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日耳曼人征服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分封制、罗马教会的教阶制与日耳曼的封建“帝王”相结合,造就出了欧洲色彩的封建制度——等级君主制。随后在经济的推助与市民力量的作用下,这种有限的君主制缓慢地演化出立宪议会制,并使其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之母。

由此,文明在发展的低谷时期,仍在创造着她的价值。

第三时期以文艺复兴的兴起为标志。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父”彼得拉克之见,文艺复兴是“modern”(现代)之始。当时的意大利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共和国较为发达,市民意识较早觉醒,所有这些,使意大利人的精神面貌与

欧洲其他地区相比有所不同。人们向往自由,希冀人世间美好的生活,而社会的一些精英分子,把民众的愿望提升、发展为一种“人文主义”,进而在精神领域掀起了一场席卷欧洲的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崇尚自然,赞美人性,倡导自由,给基督教的神性以有力的冲击。

在复兴古典文化,弘扬人文精神的同时,人文主义者对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也作了理论构想。马基雅弗里(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 ~ 1527)、让·波丹(Jean Bodin, 1530 ~ 1596)、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1583 ~ 1645)等,都对君主制、立宪制和民主制作过深入的阐述,不仅发展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制度理想,也对日后西方政治制度的实践构成影响。

文艺复兴是西方近代精神变革的先驱。文艺复兴的余波未尽,紧接着又一场大规模的精神解放运动——宗教改革,使西欧的精神变革再次进入高潮。此次运动,从宗教层面,对西方精神文化作了反思。变革后的欧洲宗教,更适应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当然,这一时期精神变革的高度综合当推启蒙运动,她不仅总结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精神变革的成果,而且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与构想,从而基本勾勒出了近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观念。于是“民主的理想,由规定了权利的法律决定的公正理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理想,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个人幸福的理想,都互相结合起来”^①。可以认为,启蒙运动是西方近代精神变革的集大成者。

^① 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欧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 页。

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运动,荡涤了旧思想、旧传统,使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欧终于战胜了封建主义,并向现代社会大步迈进。

第四时期:西方社会及政治制度的变革时期。

任何精神(观念)变革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因素。近代西欧三次观念变革,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展开的。在经历了精神的裂变和思想的动员之后,18~19世纪,西欧普遍开始了制度的革新。其共同特点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旧制度、建立新制度。

西方各国政治体制的探索是艰难而曲折的(这在法国表现得尤其明显)。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在西方文明和世界文明中都具有开创意义。它不仅开辟出了“英国式”、“美国式”、“法国式”三条革命道路和三种体制模式,也为世界近现代绝大多数国家政治制度的革新提供了样板。

19世纪是西方社会精神(思潮)大发展时期。在新经济的大力推动和新制度的保障下,各种思潮不断涌现。以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和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说,孔多塞(Auguste Comte, 1798~1857)和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的社会学理论,以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为代表的德国古典主义哲学,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等,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人的精神生活并改变着他们对世界、社会与人生的看法。其中,对社会精神影响较大的是英国的